社 会 学 研 究

就业稳定性、性别角色观念与生育意愿

刘爱玉　卢燕璇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 依托 2010 年以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七期数据,研究发现 22—60 岁男性、20—49 岁女性人群没有孩子者期望生育子女的均值为 1.52 个,有 1 个孩子及以上者期望生育的均值为 1.56 个,二孩和三孩生育意愿极低,中国的生育意愿已经属于偏低水平。作为生育主体的 80 后与 90 后显示了低于其他群体的生育意愿。推动中国低生育意愿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主要有三方面:其一,工作不稳定与收入的分化。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不稳定工作快速增加,30 岁以下年轻人就业不稳定性的比例偏高,不稳定就业会影响收入的来源及其稳定性。就业稳定性调节了已有不同孩子的父母们的生育期望。其二,性别观念变迁与性别化生育实践。性别角色观念的非传统化是 20 世纪 80 年代及之后年轻代群生育意愿偏低的主要原因。女性承担主要生育与照料责任的性别化生育实践显著弱化了女性的生育意愿。其三,人口流动与城镇化是理解中国社会性别观念变迁、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重要背景。对生育意愿现状及其变迁的理解,需要置于历史与代群脉络下,考察劳动力市场结构变迁导致的工作不稳定化与收入分化、城镇化与人口流动、性别观念及其变迁的交互作用。

关键词: 就业稳定性;性别角色观念;生育意愿
中图分类号: C 9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25)04-0121-15

引　言

不稳定工作有着诸多的社会后果。社会学者卡勒伯格(Arne L. Kalleberg)和瓦拉斯(Steven P. Vallas)在《不稳定的工作:原因、特征和后果》一书中强调不稳定就业的后果并不局限于工作和工作场所,还会波及诸多非工作领域,如个人健康和幸福、家庭形成、社会生活①。从性别维度而言,不稳定工作最重要的影响体现在社会再生产方面,比如婚姻匹配、生育意愿、家务分工和家庭稳定②。本文聚焦社会再生产中最为重要的生育意愿议题,探讨不稳定工作对这一领域的影响。

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中国自 2015 年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但生育政策的“红利”很快消失,2017 年中国出生率回落至 12.64‰,随后几年生育率呈现持续下降态势,即使 2021 年“三胎”政策放开,该年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依旧仅为 0.34‰;2022 年中国新生人口 956 万人,总人口比上年减少 85

收稿日期: 2024-11-20
作者简介: 刘爱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不稳定工作与性别观念的重塑”(21BSH080)

① Kalleberg A L. and Vallas S., *Precarious Work: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Work* (*Volume* 31), Bingley UK: Emerald, 2018, p. 2.

② Rao A H., *Crunch Time: How Married Couples Confront Unemployment*,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20; Hill M E., “Do the Marriageable Men Want to Protect and Provide: the Expectation of Black Professional Hybrid Masculinity”, *Gender and Society*, Vol. 36 No. 4, 2022, pp. 498-524.

万①,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从总和生育率看,2020 年世界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为 2.47,发达地区为 1.64,中国仅为 1.3。② 低生育率、老龄化等给国家的消费和储蓄、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国民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方面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三孩政策效果尚未显现,出生人口下降趋势可能继延,提高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迫在眉睫。

本研究核心关注的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育龄男女不愿意生育? 不稳定工作的普遍化、常态化对生育意愿产生了何种影响? 不稳定工作通过何种机制影响生育意愿? 其与其他因素之间有何种关联? 中国不稳定工作与生育之间的关系,是否会出现西方一些学者所警示的后果?

一、工作状况、收入与生育

生育行为的发生过程首先源于生育动机、态度和观念,以生育意愿的形式表现出来③。生育水平的普遍降低与生育意愿密切相关,因此,在普遍低生育率背景下,考察生育意愿及其形塑机制尤为必要。

就业与生育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是工作与家庭间的关系,其二是工作作为收入的主要来源对生育的影响。从工作与家庭关系角度看,学界的研究主要关注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冲突对婚育的影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Goldin 梳理了美国 20 世纪五个世代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在“工作—家庭”方面的命运与应对。第一世代女性只能在家庭与事业中二选一,她们中约有 1/3 终身未婚,1/2 终身未育;第二世代女大学生通常选择先就业再成家,成家后的女性因政府、学校等机构对雇佣已婚女性的限制不得不辞职,工作生涯因结婚生育而终结;第三世代女性很大程度上颠覆了早期的模式,是先家庭再就业。由于战后美国经济复苏带来的就业机会,不少女性在子女长大后回归职场,或是结婚成家后选择家庭友好型工作,往往是兼职或因为生育而时常中断职业;第四世代女性是先事业再家庭,她们在女权运动的鼎盛时期接受了高等教育,许多人非常渴望事业,借助避孕药技术推迟婚育,先开启职业生涯,然后建立家庭;第五世代女性是兼顾事业与家庭,她们会公开表达同时获得事业和家庭的愿望,有些女性甚至开始主动尝试单亲育儿并兼顾事业④。

面对“工作—家庭”冲突,一方面职场男女需要在工作与家庭间恰当分配时间和精力,另一方面他们还面临来自家庭、雇主、社会各方对“理想工人”与“理想父母”的评价压力。“理想工人”把工作置于首位,遵循工作奉献图式,全职在外工作,加班加点,酬报丰厚,稳定工作和晋升是对他们的奖赏⑤。“理想母亲”把家庭置于首位,遵循家庭奉献图式⑥,认为母亲是孩子最理想、最合适的照料者,母亲应以孩子身心发展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全身心投入孩子的照料和教育,甚至放弃自己的需要和利益。其具体表现是:一方面密集投入时间,全天候不间断关心、照料子女;另一方面密集投入情感和责任,为下一代

①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官网,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28_1919011.html。

② 佟新、李建新:《人口社会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4 年版,第 43 页。

③ Miller W B., “Personality Traits and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s as Antecedents of Childbearing Motivation”, *Demography*, Vol. 29, No. 2, 1992, pp. 265-285.

④ Goldin C., *Career and Family-Women's Century-Long Journey toward Equit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1.

⑤ Williams J., *Unbending Gender: Why Family and Work Conflict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⑥ Bianchi S M. Robinson J P. and Milkie M A., *The Changing Rhythms of American Family Lif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6.

的每个教育阶段负责①。因此,如果难以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消解两者的冲突,必然会影响生育意愿和生育实践。有学者指出,女性的双重身份使经济发展、性别平等和生育三者密切关联。三者关系若处理不好,我国女性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同时担负更多育儿和养老责任,今后我国的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更严峻。②

从工作作为收入的主要来源角度考察对生育的影响,贝克尔为代表的学者基于家庭抚养孩子的成本、父母从孩子身上获得的效用或收益分析了生儿育女的经济决策和家庭规模的经济效应。可见,家庭收入对生育意愿和决策有重要作用,但关于收入对生育的效应,有不同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从收入看就业与生育的关系,影响是一正一负:正面影响是就业扩展了家庭预算水平,提升了养育子女的经济能力,表现为"收入效应";负面影响是就业增加了生育的机会成本,抑制了生育意愿,表现为"替代效应"③。学者 Raymo 的研究发现,日本社会经济下行与就业不稳定增加并未导致生育率下降,因为日本以婚内生育与"男主外、女主内"为主流,男性和女性在家庭中经济角色高度分化,失业和非标准就业对男性可能是负面的,经济下行降低了男性结婚水平进而降低生育率,但对女性可能是正面的,经济下行反而提高了女性的婚内生育水平。一负一正的相反结果导致了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失业与非标准就业的上升反而提高了日本社会的生育率,限制了经济衰退的整体影响④。中国学者的研究发现,中国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已婚女性生育意愿比正规部门就业的已婚女性平均高 0.465 个。由于非正规就业工资收入更低,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生育机会成本减少,提升了女性生育意愿⑤。

第二种看法认为收入与生育间并非线性关系,国外学者通过人口变化数据分析得出财富水平与生育率之间并非线性单一关系的结论⑥。经济收入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育的经济压力,同时也增加了生育的机会成本。生育意愿与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呈现显著的"U 型"曲线关系,生育意愿随家庭人均收入的提高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⑦。Kreyenfeld 的研究发现,当就业不太稳定时,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推迟生育,教育水平低的女性会选择生育⑧。田志鹏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结论,他发现中等收入群体的生育意愿高于低收入群体;家庭就业稳定性对不同收入群体生育意愿的影响有所不同,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中家人无业或不稳定就业对其生育意愿有正向影响,而在中等收入家庭中对生育意愿有负向影响⑨。

第三种看法认为:由不稳定或者非正规就业导致的收入不稳定与不确定,使得以确定性、筹划性为

---

① Murphy E.,Risk,"Responsibility and Rhetoric in Infant Feeding",*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Vol. 29,No. 3,2000,pp. 291-326.

② 赵梦晗、计迎春:《丈夫的家务劳动参与和女性初育风险》,《人口研究》2019 年第 1 期,第 64—77 页。

③ Beck G S.,*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8.

④ Raymo J M. and Shibata A.,"Unemployment, Nonstandard Employment, and Fertility: Insights from Japan's 'Lost 20 Years'",*Demography*,Vol. 54,No. 6,2017,pp. 2301-2329.

⑤ 李红阳:《非正规就业对已婚女性个体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 CHNS 数据的研究》,《财经论丛》2022 年第 1 期,第 3—14 页。

⑥ Clark G. and Cummins N.,"Malthus to Modernity: Wealth,Status,and Fertility in England,1500-1879",*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Vol. 28,No. 1,2014,pp. 3-29.

⑦ 何明帅、于淼:《家庭人均收入、代际社会流动与生育意愿》,《劳动经济研究》2017 年第 9 期,第 117—140 页;Zheng Z. Yong C. Wang F. and Gu B.,"Below-replacement Fertility and Childbearing Intention in Jiangsu Province, China",*Asian Population Studies*,Vol. 5,No. 3,2009,pp. 329-347。

⑧ Kreyenfeld M.,"Uncertainties in Female Employment Careers and the Postponement of Parenthood in Germany",*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 26,No. 3,2010,pp. 351-366.

⑨ 田志鹏:《中等收入群体家庭就业稳定性与生育计划研究——基于 2017 年和 2019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4 期,第 112—119 页。

基础的生育决策实施困难。有学者的研究证实,由工作不稳定引起的收入不确定或收入不确定的担忧将降低居民生育意愿①。

第四种看法认为:由不稳定或者非正规就业导致的收入受损对生育的影响具有性别化效应。以比较极端的失业为例,其对生育的影响具有性别化差异。暂时性失业会减少生育的机会成本,相当于脱离劳动市场的成本,此即“替代效应”,它意味着失业后生育率的提高。这种机制对女性来说可能特别突出,女性生孩子的动机不仅在于养育孩子的低机会成本,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也被视为减少不确定性的理性选择,可以缓解家庭和工作的冲突,并降低育儿的成本。失业还可能通过其他方式影响生育率。工作调动属于“触发事件”,会扰乱生活进程,并可能导致劣势的积累或“疤痕效应”②。女性是生育行为的实际承担者,在生育、抚养阶段需要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承担“职业空窗期”以及工作和家庭冲突带来的间接成本。因此,社会经济资源(通过就业、收入和受教育程度衡量)对女性生育意愿具有负面影响,但对男性生育意愿有正影响或没有显著影响③。Kreyenfeld 考察了经济不确定性和生育率间的关系,发现女性就业的不确定性不一定导致生育推迟,经济不确定性与初育之间的关系因受教育程度不同而存在差异,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在面临就业不确定性时推迟生育,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往往以生育作为替代选择,因为男性的就业安全是家庭构建的先决条件④。从个体视角出发,相对女性,男性就业稳定状态对其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更小,而就业状态的不稳定对其生育意愿的影响更加显著⑤。

上述关于就业状况、收入与生育观念与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为考察中国不稳定就业增长背景下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提供了有益基础。本研究对生育意愿的考察将以更具历史跨度的多期数据为基础,并聚焦工作不稳定、收入及两性对性别角色分工认知的交互作用。不稳定就业的提法最早出现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欧洲,指就业缺乏传统的标准形式和契约保障⑥,之后一些学者将其视为一种不确定、不可预测以及有风险的就业状态⑦。McDowell 等认为不稳定工作包括各种涉及工作不安全感、有限法定权利(包括工作场所和社会福利)、低工资、较高健康风险的工作⑧。Goldring 等则提出八个测量工作不稳定性的指标:无工会、无书面合同/口头合同/短期合同、散工/家务工/季节工、工作时间不确定、计件工

① Karabchuk T.,“Job Instability and Fertility Intentions of Young Adults in Europe: Does Labor Market Legislation Matter?”*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688, No. 1, 2020, pp. 225-245;张琪、张琳:《生育支持对女性职业稳定的影响机制研究》,《北京社会科学》2017 年第 7 期,第 32—39 页。

② Nallo D A. and Lipps O.,“How Much His or Her Job Loss Influences Fertility: A Couple Approach”,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Vol. 85, No. 4, 2023, pp. 873-897.

③ Iacovou M. and Tavares L P.,“Yearning, Learning, And Conceding: Reasons Men and Women Change Their Childbearing Intentions,”*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37, No. 1, 2011, pp. 89-123.

④ Kreyenfeld M.,“Uncertainties in Female Employment Careers and the Postponement of Parenthood in Germany,”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6, No. 3, 2010, pp. 351-366.

⑤ Ahmed S I.,“The Link between Employment Stability and Fertility Intention: A Cross Sectional Stud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Vol. 10, No. 2, 2018, pp. 10-20.

⑥ Ferreira M.,“Informal versus Precarious Work in Colombia: Concept and Operationalization,”*Progress in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16, No. 2, 2016, pp. 140-158.

⑦ Kalleberg A L.,“Precarious Work, Insecure Workers: Employment Relations in Transition,”*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74, No. 1, 2009, pp. 1-22.

⑧ McDowell L. Batnitsky A. and Dyer S.,“Precarious Work and Economic Migration: Emerging Immigrant Divisions of Labour in Greater London's Service Sector,”*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 33, No. 1, 2009, pp. 3-25.

作、没有福利减免优惠、现金支付、在雇主家里/自己家里/多个地点上班①。卡勒伯格在影响甚广的《好工作，坏工作》一书中将不稳定工作分为五个核心维度:经济报酬、工作保障与升迁、工作自主性、对工作时间的控制、工作满意度②。综合以上讨论,本文将从劳动关系契约、工作任期、工作社会保障、工作收入四个方面对不稳定就业进行考察。

二、文化、性别观念与生育实践

文化作为社会生活的核心构成,其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呈现三阶段递进特征:其一,文化为社会行动者提供多元的行动策略资源库或工具箱③,文化也形塑社会行动者的习惯、技能和风格的所有储备或工具箱;其二,文化在特定群体的社会行动或社会互动中体现出来④;其三,在群体社会行动基础上,文化作为群体风格和群体的社会表征体系,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⑤。Swidler 辨析了文化在社会稳定时期和社会变迁时期的不同影响模式。在社会稳定时期,文化独立地影响社会行动,但仅仅是为社会行动者的多重行动路线提供行动资源;而在社会变迁时期,行动的社会结构限制决定了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的生存图景,在竞争中占据优势的外显的意识形态主宰社会行动的行动策略⑥,文化观念不仅支配着主流的社会评价标准,还对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不同组织的角色及能力产生影响⑦。

性别是文化组织社会关系的主要框架之一⑧,其规范体系深度介入两性关系的道德信念、象征系统、认知模式、身份认同及生活实践。性别文化规范作为"社会事实",通过形塑两性角色定位、引导教育投资与能力培养,系统建构了两性在教育、能力与价值观层面的差异。这种差异经代际社会化沉淀为个体的主体意识,并在社会生活中以无意识方式实践,最终强化并再生产性别角色结构与性别秩序。性别意识形态在此过程中为行动提供意义框架——既定义个体对自我的认知,也提供价值评价标准与行为正当性依据。

夫妻关系及其生育深受性别文化影响。传统社会重视的并非个体追求的爱情,而是要确保男子家族的子嗣绵续和宗庙祭祀。夫妻关系必须放在伦理语境中才可能被恰当地理解。受儒家文化影响,传统社会的婚姻与生育有诸多特点。第一,早婚与普遍婚的习俗,父母会在子女年龄较小时安排婚事,绝大部分人都需要进入婚姻。第二,婚前性行为被严格禁止,一旦违反,家族有权利对家庭成员进行惩罚,婚外性行为也会受到强烈的道德谴责,甚至会因触犯法律而受到制裁⑨。婚前与婚外生育现象极其少见。第三,养育子女是家庭最重要的功能,"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被奉行了超过千年,我国生育率在历史上也一直维持较高水平⑩。第四,生育、生儿子对中国农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男孩偏好源于儒家

---

① Goldring L. Berinstein C. and Bernhard J.,"Institutionalizing Precarious Migratory Status in Canada," *Citizenship Studies*, Vol. 13, No. 3, 2009, pp. 239-265.

② Kalleberg A., *Good Jobs, Bad Jobs: The Rise of Polarized and Precarious Employment System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0s to 2000s*, New York: Russell Sage, 2011.

③ Swidler A.,"Culture in Action: Symbols and Strateg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1, No. 2, 1986, pp. 273-286.

④ Eliasoph N. and Lichteman P.,"Culture in Inter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8, No. 4, 2003, pp. 735-794.

⑤ Moscovici S., *Social Representations: Explorations in Social Psychology*, Cambridge: Polity, 2000.

⑥ 方文:《群体符号边界如何形成?》,《社会学研究》2005 年第 1 期,第 25—59+246 页。

⑦ 张静:《经济活动对文化观念的影响——以乡村社会为例的研究》,《社会科学》2022 年第 4 期,第 145—153 页。

⑧ Ridgeway C L.,"Interaction and the Conservation of Gender Inequality: Considering Employ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2, No. 2, 1997, pp. 218-235.

⑨ Sommer M H., *Sex, 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loomingt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⑩ 於嘉、谢宇:《中国的第二次人口转变》,《人口研究》2019 年第 5 期,第 3—16 页。

文化价值与民众生活实践中儿子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为经济、养老和宗教功能。首先,悠久的农业社会传统以及农业生产对体力的高要求使男性成为家庭经济来源的保障。儿子还通过结婚带来儿媳,儿媳参与农业或副业生产也会为家庭创造利益,因此儿子具备更重要的经济功能①。其次,儒家文化强调孝道的重要性,儿子是家庭的永久成员并担负赡养父母的义务,因此儿子的养老功能受到文化与价值的规定②。另外,在祖先崇拜的文化传统下,只有儿子能够承担传承血脉和传递姓氏的重任,只有男性后代能向祖先供奉香火,因此儿子比女儿具备更重要的宗教象征意义③。第五,在传统家庭系统中,婚姻是长期且稳定的,离婚极为少见,且只有丈夫可以向妻子提出离婚,离婚女性受到强烈的社会歧视。第六,我国传统的家庭以男性为主导,女性在家庭中地位较低且没有自主权④。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欧洲主要国家的婚姻和家庭发生了深刻变化:结婚率下降、初婚年龄推迟、婚前和离婚后同居比例增加、离婚率上升、终生不婚比例不断提高、初育年龄上升,最终导致了生育率下降,进入了超低生育时代,即人口学家所言的第二次人口转型。以 Lesthaeghe 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上述人口转变的根本原因是个体观念变化,个体主义的兴起推动了女性社会角色、性观念、家庭观念等方面的转变,女性更加重视自我实现、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家庭重心开始从“孩子至上”转向“夫妻至上”。传统家庭往往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到孩子身上,通过减少子女数量保证每位子女获得更多资源,以实现向上流动。现代家庭的重心逐渐回归夫妻关系,夫妻可能为了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而选择不生育。年轻一代更强调自身需求,认为生育是个人自由,不应受他人(包括家庭)干预,个体主义动机不断强化⑤。换言之,以个人主义为核心、更强调个体价值、自主自由选择的性别意识形态和婚育观,是低生育率的重要原因。一些研究发现,受现代性别角色影响的女性的生育意愿低于那些以家庭为中心、受传统社会性别角色影响的女性⑥。与以家庭为重的女性相比,以事业为重的女性更倾向于少要孩子⑦。

性别文化通过两种路径影响生育意愿和实践:第一种路径是性别社会压力机制,性别观念影响人们对工作和家庭中承担角色的认知。性别观念呈现出多样化特征,一方面传统的性别观念仍有追随者,另一方面出现了两性平等观念和过渡型的观念。持两性平等观念的人认为男性和女性均可平等追求事业,或认为男性和女性应均担家庭责任。在完全传统和完全平等之间,还有一种过渡型的观念,这种观念虽认可女性劳动参与的价值,但仍然认为女性应该承担主要的家庭责任,而男性应该更多投入事业⑧。第二种路径是文化符号机制,两性给工作赋予了性别化意涵。在中国传统的社会性别文化语境下,女性面临以男性话语霸权为中心的父权制文化的贬斥、规训乃至依附,缺失话语权,遵从男权文化,产生了“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等不平等的社会性别观念。这些不平等的性别观念主要通过传统性别本质主义与性别建构主义的方式形塑两性群体在社会关系与社会互动中的权力结构⑨。

---

① 杨菊华:《男孩偏好与性别失衡:一个基于需求视角的理论分析框架》,《妇女研究论丛》2012 年第 2 期,第 23—35 页。

② 王文卿、潘绥铭:《男孩偏好的再考察》,《社会学研究》2005 年第 6 期,第 165—193+245 页。

③ 陆杰华、刘畅:《区域性别文化影响视角下的性别收入不平等研究——基于 2018 年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验证》,《西北人口》2023 年第 1 期,第 15—28 页。

④ 费孝通:《江村经济》,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

⑤ Lesthaeghe R.,“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 Concise Overview of its Development,”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 111, No. 51, 2014, pp. 18112-18115.

⑥ Miller W B. and Pasta D J.,“Motivational and Nonmotivational Determinants of Child-number Desires,”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Vol. 15, 1993, pp. 113-138.

⑦ Vitali A. Billari F C. Prskawetz A. and Testa M R.,“Preference Theory and Low Fertility: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Vol. 25, No. 4, 2009, pp. 413-438.

⑧ Hochschild A. and Machung A., *The Second Shift*,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3.

⑨ 佟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85—287 页。

国内一些研究也证实性别观念对生育的影响,如石智雷等的研究发现,性别平等观念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城乡二元"特征。我国农村存在浓厚的生男偏好,家庭地位低的女性往往在生育偏好与性别歧视压力下做出非理性的生育决策,直到生出儿子为止。不论城乡,一孩为男孩的家庭更希望二孩为女孩。在城市中,一孩为女孩的家庭对二孩的性别偏好不明显,而农村家庭中一孩为女孩的单独家庭在二孩上存在明显的男孩偏好①。计迎春、郑真真认为,在"工作—家庭"的冲突中,女性日益以工作为重,影响了其在私人领域的婚姻动机和生育决定,她们选择尽量少生,从而导致了西方发达社会、东亚社会和我国普遍存在的低生育现象②。两性在劳动就业的相对平等和家庭内部的传统分工长期并存,女性更多地承受兼顾工作和家庭的负担。传统性别角色分工导致的女性在照料和家务方面的付出,对女性生育决策产生了复杂影响,成为带动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因素之一③,以上讨论意味着非传统性别观念的扩散和广为接受对生育意愿有抑制作用。胡荣、林彬彬的研究也发现,传统性别观念的认同对中国女性的生育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女性越是认同传统性别观念,越倾向于生育多个孩子;越是不赞成传统性别观念,越倾向于少生育孩子④。综上,性别文化尤其是其核心表征的性别观念对生育意愿与生育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有关两者之间关系的经验研究却很欠缺。

三、生育意愿的经验分析

(一)生育意愿的基本情况

生育意愿指个人对生育行为的主观看法和态度,主要从数量、生育时间安排、子女性别偏好和素质四个维度反映生育期望⑤。基于生育意愿的相关调查,现有研究主要通过三类指标测度生育意愿:理想子女数、意愿子女数、计划子女数⑥。生育理论通常认为理想子女数量的减少是驱使生育转变的最根本动力⑦。

本文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数据,并基于 2010 年、2012 年、2013 年、2015 年、2017 年、2018 年、2021 年七期数据分析就业稳定性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分析对象限定为 22—60 周岁男性、20—49 周岁女性,共 45334 人。中国目前法定结婚年龄规定"男不得早于 22 周岁,女不得早于 20 周岁",且人口学意义上的女性生育历程一般截止到 49 周岁。为考察就业稳定性的作用机制,我们重点分析上述年龄范围内的非农在业人员,符合条件人员共计 28900 人。剔除相关分析变量缺失值后,有效样本为 25254 人,其中男性 14377 人,占 56.9%,女性 10877 人,占 43.1%。

本文的因变量为生育意愿,将着重考察是否愿意生孩子、期望生多少个孩子、生男生女的偏好三个方面,在进行生育意愿的多元回归分析时,因变量为:(1)是否愿意生育,以是否想生育来界定。郑丹丹等学者认为生育意愿从 0 转变为 1,反映的是个体是否跨越生育的心理门槛,具有质变性质,值

---

① 石智雷、杨云彦:《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家庭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人口研究》2014 年第 5 期,第 27—40 页。

② 计迎春、郑真真:《社会性别和发展视角下的中国低生育率》,《中国社会科学》2018 年第 8 期,第 143—161+207—208 页。

③ 郑真真:《20 世纪 70 年代妇女在生育转变中的作用——基于妇女地位、劳动参与和家庭角度的考察》,《妇女研究论丛》2019 年第 5 期,第 5—13 页。

④ 胡荣、林彬彬:《性别平等观念与女性生育意愿》,《求索》2020 年第 4 期,第 142—148 页。

⑤ 郑真真:《20 世纪 70 年代妇女在生育转变中的作用——基于妇女地位、劳动参与和家庭角度的考察》,《妇女研究论丛》2019 年第 5 期,第 5—13 页。

⑥ 靳永爱、宋健、陈卫:《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中国城市女性的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人口研究》2016 年第 6 期,第 22—37 页。

⑦ 杨菊华:《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发达国家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述评及对中国的启示》,《学海》2008 年第 1 期,第 27—37 页。

得特别考察。本文据受访者对问卷中“如果没有政策限制的话,您希望有几个孩子”的回答,将不愿生育的赋值为 0,将希望生育的孩子数大于 0 的赋值为 1①。(2)是否期望生育 2 个及以上孩子。本文将希望生育孩子数大于等于 2 的赋值为 1。(3)是否期望生育至少 1 个儿子。(4)期望孩子数量。

核心自变量分为四个模块:(1)个人资源。核心关注就业状况和收入的影响。其一,就业稳定性。本文通过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障测量就业稳定性,将不稳定就业编码为 1,稳定就业编码为 0。通过因子分析和信度分析,以劳动合同、社会保障对就业稳定性进行测量,信度系数为 0.66,符合分析要求。其二,收入群体。本文关注不稳定就业导致的收入分化对生育意愿产生的影响,参考学界既往标准,将分析对象收入中位数的 75%—200%定义为中等收入群体②。下文进行模型分析时将考察不稳定就业、收入群体对生育意愿的分别影响,以及两者的交互作用,即不稳定就业所调节的收入群体在生育意愿上的分化。(2)家庭层面因素,主要考察婚姻状况、已有子女数两方面。(3)性别观念,我们对 CGSS 七期调查涉及的性别观念进行了信度与效度检验,最终选择了效度最高的性别角色分工观念,同意与比较同意者编码为 1,表示支持传统性别角色分工观念。控制变量为:教育、政治面貌、年龄代群、民族、城乡、户籍、地区、自评健康、调查年份。根据有效样本计算的生育意愿的基本情况如表 1:

表 1 样本生育意愿描述性统计信息

变量	期望生 1 个及以上	期望生 2 个及以上	期望至少 1 个儿子	期望孩子数	变量名	期望生 1 个及以上	期望生 2 个及以上	期望至少 1 个儿子	期望孩子数
分类变量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均值	分类变量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均值
就业稳定性					民族				
稳定就业	96.8	61.7	82.7	1.66	少数民族	97.6	68.6	88.1	1.87
不稳定就业	98.2	65.5	88.7	1.75	汉族	97.7	63.7	86.0	1.70
收入群体					政治面貌				
低收入群体	97.7	65.1	87.1	1.74	非党员	97.5	64.1	85.8	1.71
中等收入群体	97.9	63.6	86.0	1.71	党员	98.6	63.4	87.9	1.72
高收入群体	96.8	62.7	84.3	1.69	地区				
性别					东部	96.9	62.0	84.1	1.68
女性	97.3	62.5	83.4	1.67	中部	98.8	70.8	91.7	1.80
男性	97.8	65.1	88.2	1.75	西部	98.4	68.4	87.9	1.79
出生代群					东北	96.7	49.9	78.9	1.54
50 后	97.9	59.7	89.1	1.72	自评健康				
60 后	98.1	63.4	88.3	1.73	不健康	96.3	64.7	84.4	1.75
70 后	98.5	65.0	87.7	1.74	一般	97.1	63.3	85.4	1.70
80 后	97.7	63.9	84.7	1.69	健康	97.9	64.1	86.5	1.71
90 后	93.1	66.1	77.6	1.66	性别角色分工观念				

① 严翔、郑丹丹:《无心还是无力? ——主观阶层认知、健康与生育意愿研究》,《求索》2024 年第 2 期,第 166—177 页。

② 李培林、朱迪:《努力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基于 2006—2013 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5 年第 1 期,第 45—65+203 页。

续表 1

变量	期望生 1 个及以上	期望生 2 个及以上	期望至少 1 个儿子	期望孩子数	变量名	期望生 1 个及以上	期望生 2 个及以上	期望至少 1 个儿子	期望孩子数
分类变量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均值	分类变量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均值
婚姻状况					非传统	96.7	62.3	82.5	1.67
未婚	91.8	56.7	76.4	1.56	传统	98.6	65.8	89.6	1.76
在婚	98.8	65.5	88.1	1.75	调查时间				
已有孩子数					2010	97.7	7.3	87.1	1.06
0 个	90.8	54.0	74.8	1.52	2012	98.8	72.0	89.5	1.82
1 个	98.8	52.4	82.9	1.56	2013	98.3	70.9	88.3	1.80
2 个及以上	99.6	86.4	95.2	2.04	2015	98.2	76.0	87.8	1.84
户籍					2017	97.1	71.8	84.4	1.81
农业户籍	98.6	70.8	89.8	1.81	2018	96.3	71.0	82.4	1.79
非农业户籍	96.7	58.1	82.8	1.63	2021	95.3	70.1	79.2	1.77
城乡					连续变量	平均值	平均值	平均值	平均值
农村地区	99.1	73.0	91.3	1.84	教育	11.4	11.3	11.2	11.3
城镇地区	97.2	61.6	84.6	1.68	年龄	39.4	39.6	39.4	39.4

不考虑已有孩子数量,在政策允许情况下,希望生育 1 个的占 33.6%,希望生育 2 个的占 57.2%,希望生 3 个及以上的占 6.8%,不想生育的占 2.4%。考虑已有孩子数量,目前没有孩子的人中,不愿意生育者占 9.2%,希望生育 1 个者占 36.8%,希望生育 2 个者占 49.6%,希望生育 3 个及以上者占 4.4%;目前有 1 个孩子的人中,不愿意生育者占 1.2%,希望生 1 个的占 46.4%,希望生育 2 个的占 48.9%,希望生育 3 个及以上者占 3.5%;目前有 2 个孩子者,希望生 1 个的占 12.9%,希望生 2 个的占 80.3%,希望生 3 个及以上的占 6.3%。从期望孩子数看,没有孩子者期望均值为 1.52,有 1 个孩子者期望均值为 1.56,有 2 个孩子的期望均值为 2.04,有效样本全部人群的理想子女为 1.71 人,其中男性期望为 1.75 人,女性期望为 1.67 人。从期望的子女性别看,期望至少有 1 个儿子者占 86.1%。上述生育意愿的总体水平,相比 2000 年之前又有所降低。对比其他低生育率国家或地区的理想子女数可以看到:中国已经是一个生育意愿非常低的国家。

1982 年计划生育政策正式写入宪法,2015 年 12 月 27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2016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我们发现:二孩生育意愿自 2010 年以来经历了很大的变化,CGSS 从 2010 年开始对政策如果没有限制下希望生育子女数进行调查,2010 年仅有 7.3%的人希望生育 2 个及以上孩子,2012 年调查时希望生育二孩比例高达 72%,2013 年是 71%,2015 年是 76%,2017 年又回落到 72%,2021 年时二孩生育期望者总体为 70%。从 2017—2021 年期间分年龄组群的二孩生育期望看,是两种变化交互作用,导致愿意生育二孩比例的下降。从群际变化看,30 岁以下年轻人的二孩生育意愿大幅度下降,男性和女性相似,18—24 岁年龄群的二孩期望者下降了 20%,25—29 岁年龄群的二孩期望者下降了 12%。从群内变化看,2017 年 18—24 岁年龄群中有 68.3%期望子女是二孩,但到 2021 年大约只有 48.5%人持有此想法,下降了 19.8 个百分点。

(二)不稳定工作、性别观念与生育意愿

表 2 的八个模型主要考察个人资源、收入群体、家庭层面因素、性别观念等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核心关注控制其他因素后,工作及其密切相关的收入、性别观念对生育意愿的作用机制,由此对话文献综述

中的一些研究发现。

模型 1a、模型 2a、模型 3a、模型 4a 的因变量分别为是否愿意生育(期望生 1 个及以上孩子)、二孩生育意愿(是否期望生育 2 个及以上孩子)、生育性别偏好(是否期望生育至少 1 个儿子)、期望孩子数量。模型分析的核心自变量为本人工作状况(就业稳定性)、收入群体、性别观念,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出生代群、户籍类型、城乡、民族、地区、教育、政治面貌、调查时间等。前三个采用 logit 模型,模型 4a 根据理想子女数变量的特点采用了 poisson 分析模型。

模型 1b、模型 2b、模型 3b、模型 4b 在上述四个模型基础上增加了三个交互变量。第一个交互变量是就业稳定性与收入群体,主要考察就业稳定性对不同收入群体生育意愿的调节效应,即不同收入群体遭遇家人失业或就业不稳定时做出的不同选择。对中等收入家庭而言,不稳定工作意味着缺少稳定、可持续的收入以负担多生养子女的成本,而对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则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力照料多生养的子女。第二个交互变量是工作稳定性与已有子女数,考察目前工作状况对生育更多子女的计划。第三个交互变量是出生代群与性别角色分工观念。出生代群分为五个类别:50 后(1950—1959 年出生)、60 后(1960—1969 年出生)、70 后(1970—1979 年出生)、80 后(1980—1989 年出生)、90 后(1990—1999 年出生)。起始年龄定为 1950 年,因为 2010 年调查时 60 周岁的男性正好是 1950 年出生。此前分析提到,1980 年及其之后出生的年轻人的性别观念比之前的代群更为非传统;描述分析时,我们也看到 18—24 岁、25—29 岁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与其他代群显著不同。因此,不同出生代群的生育意愿可能受到性别观念的调节,我们希望通过出生代群与性别角色分工观念的交互项,更好地挖掘影响生育意愿的核心要素。

表 2 不稳定就业、性别观念与生育意愿

变量	期望生1个及以上	期望生2个及以上	期望至少1个儿子	期望孩子数	期望生1个及以上	期望生2个及以上	期望至少1个儿子	期望孩子数
	模型 1a	模型 2a	模型 3a	模型 4a	模型 1b	模型 2b	模型 3b	模型 4b
就业稳定性								
不稳定就业	0. 176^{+}	0. 130***	0. 086^{+}	0. 029*	0. 386*	0. 272**	0. 291**	0. 072*
收入群体								
中等收入群体	0. 330**	0. 071^{+}	0. 052	0. 009	0. 458**	−0. 011	0. 071	0. 004
高收入群体	0. 047	0. 147**	0. 062	0. 019	0. 176	0. 168*	0. 051	0. 024
中等收入群体 * 不稳定就业	–	–	–	–	−0. 221	0. 106	−0. 034	0. 008
高收入群体 * 不稳定就业	–	–	–	–	−0. 264	−0. 091	0. 039	−0. 011
受教育年限	0. 024	0. 025***	0. 004	0. 003	0. 024	0. 025***	0. 004	0. 003
性别:男性	0. 291**	0. 097**	0. 343***	0. 027*	0. 265**	0. 083**	0. 329***	0. 025*
性别角色分工观念:传统	0. 455***	0. 189***	0. 289***	0. 028**	0. 344	−0. 048	0. 192	−0. 021
出生代群								
60 后	0. 336^{+}	0. 117^{+}	0. 119	−0. 001	0. 416	−0. 009	0. 148	−0. 027
70 后	0. 945***	0. 138^{+}	0. 219*	0. 001	0. 944**	0. 034	0. 183	−0. 024
80 后	1. 364***	0. 080	0. 240*	−0. 004	1. 202***	−0. 103	0. 136	−0. 047
90 后	1. 100***	0. 144	0. 259*	−0. 012	0. 955**	−0. 140	0. 092	−0. 073*

续表 2

变量	期望生1个及以上	期望生2个及以上	期望至少1个儿子	期望孩子数	期望生1个及以上	期望生2个及以上	期望至少1个儿子	期望孩子数
	模型 1a	模型 2a	模型 3a	模型 4a	模型 1b	模型 2b	模型 3b	模型 4b
性别角色分工观念与代群交互								
60 后偏传统	-	-	-	-	-0.210	0.204	-0.074	0.040
70 后偏传统	-	-	-	-	-0.105	0.143	0.029	0.034
80 后偏传统	-	-	-	-	0.388	0.298*	0.187	0.068+
90 后偏传统	-	-	-	-	0.419	0.638***	0.470*	0.127**
婚姻状况:在婚	0.967***	0.187***	0.245***	0.031+	0.975***	0.195***	0.252***	0.032+
已有孩子数								
1 个	1.858***	-0.127*	0.387***	0.023	1.889***	-0.076	0.463***	0.039+
2 个及以上	2.950***	2.605***	2.066***	0.280***	3.469***	3.137***	2.495***	0.326***
1 孩 * 不稳定就业	-	-	-	-	-0.789	-0.138+	-0.176+	-0.036
2 孩 * 不稳定就业	-	-	-	-	-0.782+	-0.819***	-0.693***	-0.077*
户籍:非农业	-0.469***	-0.104**	-0.277***	-0.014	-0.482***	-0.114**	-0.284***	-0.016
城乡:城镇	-0.445**	-0.084+	-0.090	0.002	-0.438*	-0.076	-0.093	0.002
民族:汉族	0.225	-0.241**	-0.036	-0.075***	0.225	-0.246**	-0.040	-0.076***
政治面貌:党员	0.574***	0.185***	0.281***	0.029+	0.568***	0.181***	0.280***	0.028+
地区:中部	0.565***	0.284***	0.473***	0.018	0.564***	0.277***	0.467***	0.017
西部	0.568***	0.128**	0.170**	0.014	0.568***	0.121**	0.168**	0.013
东北	-0.163	-0.479***	-0.361***	-0.069***	-0.161	-0.489***	-0.369***	-0.070***
自评健康:一般	0.344*	0.052	0.248**	-0.004	0.361*	0.045	0.245**	-0.004
健康	0.643***	0.064	0.337***	0.005	0.654***	0.059	0.333***	0.005
调查时间:2012	0.701***	4.744***	0.184*	0.544***	0.697***	4.665***	0.183*	0.543***
2013	0.296+	4.697***	0.081	0.536***	0.292+	4.621***	0.082	0.535***
2015	0.215	4.918***	-0.012	0.553***	0.206	4.438***	-0.017	0.551***
2017	0.117	4.803***	-0.122	0.559***	0.105	4.473***	-0.111	0.559***
2018	-0.674***	3.659***	-1.213***	0.447***	-0.702***	3.548***	-1.241***	0.446***
2021	-0.701***	4.433***	-0.713***	0.509***	-0.692***	4.373***	-0.698***	0.510***
常数项	-0.209	-4.689***	0.379*	-0.088*	-0.244	-4.496***	0.374+	-0.071
Log likelihood	-2200.82	-11620.61	-7604.45	-33290.8	-2194.14	-11582.15	-7584.16	-33282.5
Pseudo R2	0.227	0.296	0.114	0.028	0.230	0.298	0.116	0.028
样本数	25254	25254	21280	25254	25254	25254	21280	25254

注:1. +、*、**、*** 分别表示系数在 0.1、0.05、0.01 和 0.001 的水平上显著;2. 参照类分别是:就业稳定性(稳定就业)、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性别(女性)、出生代群(50 后)、婚姻状况(未婚)、已有孩子数(0 个)、户籍(农业)、城乡(农村)、民族(少数民族)、政治面貌(非党员)、地区(东部)、自评健康(不健康)、性别角色分工观念(非传统)、调查时间(2010 年)。

(1)不稳定就业、收入与生育意愿。第一,在控制其他要素情况下,无论是否考虑交互项,相比稳定就业群体,不稳定就业人群生育意愿四个维度的模型系数都是显著和正向的。以增加了三个交互项的模型系数为例,在政策允许情况下,相较稳定就业人群,不稳定就业人群希望生育 1 个及以上孩

子者比其高 47%(模型 1b),希望生育 2 个及以上者比其高 31%(模型 2b),希望至少生一个儿子者比其高 34%(模型 3b),期望的子女数也更高。无论就业状况如何,在控制其他因素情况下,相较低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期望生育 1 个孩子及以上的可能性比其高 39%(模型 1a);加入不稳定就业与收入的交互项后,中等收入人群比低收入人群的生育意愿高出 58%;在没有交互项时,中等收入人群期望生育 2 个孩子及以上的可能性比其高 7.4%,但加入交互项后,只有高收入人群相比于低收入人群在生育二孩的意愿上有显著差异,比其显著高 18%。第二,不稳定就业调节着人们在既有孩子情况下做出新的评估和选择。1 孩不稳定就业的系数为-0.138,意味着控制其他因素后,就业不稳定的 1 孩家庭期望生 2 个孩子及以上的比率是就业稳定 1 孩家庭的 87%;2 孩不稳定就业的系数为-0.819,意味着控制其他因素后,就业不稳定的 2 孩家庭期望生 2 个孩子及以上的比率是就业稳定 2 孩家庭的 44%。从生育的性别偏好看,就业不稳定的 1 孩家庭期望生至少 1 个儿子的比率是就业稳定 1 孩家庭的 83.8%,就业不稳定的 2 孩家庭期望生至少 1 个儿子的比率是就业稳定 2 孩家庭的 50%。

(2)性别角色分工认知与生育意愿。未纳入性别角色分工观念与代群交互项时,性别角色分工观念与出生代群在控制其他因素情况下,对生育意愿都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相比持有非传统性别角色分工观念者,希望生育 1 个及以上孩子、希望生育 2 个及以上、希望至少生 1 个儿子、期望子女数都显著更高。以 50 后作为参照,之后各个代群的生育意愿也显著更高。纳入三个交互项后,上述两个要素的主效应消失,但是交互效应显著,尤其体现在二孩生育意愿、性别偏好和理想子女数方面。从二孩生育意愿看,80 后偏传统人群期望生 2 个孩子及以上的比率是 80 后非传统者的 147%,90 后偏传统人群期望生育 2 个及以上孩子的比率是 90 后非传统者的 189%。从生育的性别偏好看,90 后偏传统人群期望生至少 1 个儿子的比率是非传统者的 160%。因此,如果 80 后、90 后人群中持有偏传统性别观念的比例高,必然会提升整体生育意愿,缓解或者改善目前的低生育现象。不过,从性别观念的队群分析可以看到,80 后、90 后的性别观念更偏现代,在持有传统性别观念的比例上,越年轻的代群所占的比例越低。80 后性别观念偏传统者占 44.3%,90 后性别观念偏传统者占 30.7%。80 后、90 后是生育主体,年轻代群性别观念的非传统化,成为二孩政策放开后生育水平未能提升的重要原因。

(3)婚姻、性别与生育意愿。在控制其他要素的情况下,无论是否有交互变量,在婚人群的生育意愿都显著高于未婚人群。相比未婚人群,在婚人群希望生育 1 个及以上孩子的比率比其高 165%(模型 1b)、希望生育 2 个及以上孩子者比其高 22%(模型 2b)、希望至少生 1 个儿子者比其高 28.7%(模型 3b)。男性的生育意愿也都显著高于女性。男性希望生育 1 个及以上孩子者的比率比女性高 30%(模型 1b),希望生育 2 个及以上孩子者比女性高 8.7%,希望生育至少 1 个儿子者比女性高 39%。女性的生育意愿明显低于男性,已婚群体的生育意愿更高,这与过往诸多研究发现一致,在中国,婚姻依然是生育的基础。

(4)户籍、城乡与生育意愿。在是否希望生育、是否希望生育二孩以及生男生女方面,户籍和城乡区分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农业户籍、农村生活人群具有更高生育意愿。非农户籍者希望生育 1 个及以上孩子者的比率比农业户籍者低 39%(模型 1b),希望生育 2 个及以上孩子者比农业户籍者低 11%(模型 2b),希望生育至少 1 个儿子者比农业户籍者低 25%。城镇居住者希望生育至少 1 个孩子的比率比农村居住者少 35%,上述发现也与之前诸多研究结论基本一致。①

① 王军、王广州:《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及其影响估计》,《中国人口科学》2013 年第 4 期,第 26—35+126 页。

结　语

鉴于近几年放开二胎生育后人口依然持续负增长可能对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生育意愿成为切入探究的热点。依托 2010 年以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七期数据,我们发现 22—60 岁男性、20—49 岁女性人群在政策允许情况下,没有孩子者期望生育子女的均值为 1.52 个,有 1 个孩子及以上者期望生育的均值为 1.56 个,但生育二孩的意愿不高,比如目前已有 1 孩的 12299 人中,有意愿再生 1 个的比例为 48.9%,不到一半;有 2 个孩子及以上者期望生育均值为 2.04 个,三孩生育的意愿极低,如目前已有 2 个孩子的 7121 人中只有 448 个表示期望理想子女是 3 个及以上,即愿意生三孩者比例只有 6.3%。即使与其他低生育率国家或地区的理想子女数进行比较,中国的生育意愿也已属于偏低水平。作为生育主体的 80 后与 90 后生育意愿尤其偏低,无论是群际变化还是群内变化,都显示了低于其他群体的生育意愿。

本研究认为推动中国低生育意愿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工作不稳定与收入的分化。从各种官方数据、全国妇联妇女地位调查三期数据、CGSS2010 年以来的数据以及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看,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不稳定工作快速增加,就业非正规化和脆弱性交织,工作稳定性在 1990 年到 2021 年的 32 年间呈现倒 U 字型特点。1990 年到 2000 年间不稳定工作快速增加,2000 年到 2010 年增速减缓,2010 年之后有波折的缓慢下降,但绝大多数人的就业处境已不可逆、回归稳定化的时代。年轻人的就业处境尤为堪忧,特别是 30 岁以下的年轻人,一方面是不稳定就业比例偏高,另一方面是失业率偏高,2018 年 16—24 岁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10.8%,2020 年均值上升至 14.2%,2022 年均值上升到 17.6%,2024 年 8 月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 16—24 岁劳动力失业率为 18.8%。不稳定就业会影响收入的来源及其稳定性,影响工作时间的可控性,以及直接导致收入水平的下降。模型分析表明,相较稳定就业人群,不稳定就业人群在未控制就业稳定性与收入群体的交互项、就业稳定性与已有孩子数的交互项时,其一孩生育、二孩生育、期望子女数都显著较高。但控制了不稳定就业与收入群体、不稳定就业与已有子女数的交互项后,就业稳定性却调节了已有不同孩子的父母们的生育期望,不稳定就业对生育的实质性影响,表现为就业不稳定的 1 孩家庭期望生 2 个孩子及以上的比率比就业稳定 1 孩家庭者低 13%;就业不稳定的 2 孩家庭期望生 2 个孩子及以上的比率比就业稳定 2 孩家庭者少 54%。生育期望既是对既往选择结果的表达,也是对未来的期许。从既往生育事实的表达意义看,即使就业不稳定,父母对已经出生的孩子,从子女成长与父母之间情感关系等而言,大多是积极的认可,只有少数父母会后悔生了孩子。但对未来期许的生育意愿却会受到当下就业状况及其带来的收入的影响,我们才会看到,不稳定就业对既有孩子情况下的继续生育有负面影响。

其二,性别观念变迁与性别化生育实践。据全国妇联妇女地位调查三期数据、CGSS2010 年以来的数据以及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家庭追踪调查 2020 年数据对性别观念的统计,1990 年到 2010 年出现了一波性别观念向传统回潮的现象,而自 2010 年以来,性别观念的变迁又开始朝向平等化方向发展,尤其是 1980 年代及之后出生的代群,其性别角色分工观念中持有非传统者的比例显著高于其他代群。正如李春玲等学者所言,80 后及之后世代,与 50 后、60 后和 70 后等不同。在客观地位方面,他们赶上独生子女政策的出台契机,大多为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分担赡养父母的压力,同时赶上改革开放的时代,失去计划经济政策的保护,教育扩招、全球化等一系列变革使他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可能挣得少又花得多,生育资本难以积聚①。年轻队群内存在性别观念的异质性,在看待两性

---

① 李春玲、施芸卿:《境遇、态度与社会转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

家庭内外分工、家庭内部分工、工作-家庭何者为重上有不同立场,80、90 后年轻代群中支持类似“男人应该以工作为主,女人应该以家庭为主”看法的传统型性别价值观者,更加倾向于一孩、二孩生育,但越是年轻代群,持有传统性别角色观念者的比例却越低,即年轻代群性别角色观念的非传统化。因此,虽然大部分 80 后及之后世代个体仍将婚姻和生育视为生命历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但其生育动机逐渐从传统的习惯性动机与工具性动机转向价值性和情感性动机①。出生代群、性别观念与生育意愿的结合让我们看到了年轻代群生育意愿偏低的原因。

另外,当下中国的生育实践中依然是作为母亲的女性承担了更多的生育与养育责任②。女性因生育而承担的为人母之罚也被各种研究证实③。杨菊华的研究发现,生育对女性入职、升迁和终身发展有重要影响,当用人单位考虑女性生育二胎的可能性时,会通过提高入职门槛减少女性员工的比例,女性生育黄金期与职业发展黄金期的重叠性导致生育二胎的女性容易错过生育的最好时机,最终导致生育对女性的经济资本积累产生负面影响④。谢宇等的研究发现,每生育一个子女会造成女性工资率下降约 7%,且这一负面影响随着生育子女数量的增加而变大⑤。因此,性别观念越来越不认可传统的年轻女性的生育意愿会显著低于男性,尤其是未婚女性。

其三,人口流动与城镇化。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社会最令人瞩目的社会结构变迁是人口的快速城镇化以及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流动。户籍城镇人口由 1980 年的 19.4%增加到了 2023 年的 48.3%。自 2000 年开始统计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以来,城镇人口在 2023 年达到了总人口的 66.2%,比 2000 年增加了 30 个百分点。上述变化也成为我们理解诸如性别观念变迁、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重要背景。生育意愿的多变量分析中,我们看到非农业户籍生育一个孩子的动机、期望生育二孩的比例、理想子女数显著低于农业户籍男女。越是在城镇居住,从事非农工作时间越长,性别观念偏现代者越多⑥,也影响到这些浸染城市文化的男女的生育意愿。

所以,对生育意愿现状及其变迁的理解,需要置于历史与代群脉络下,考察劳动力市场结构变迁导致的工作不稳定化与收入分化、人口的城镇化与流动、性别观念及其变迁的交互作用。低生育意愿状况的改善,有赖于两手抓:一手抓推动年轻人高质量就业的政策与制度建设,一手抓新闻媒体和舆论对性别观念的引导。习近平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强调:家庭和睦、家教良好、家风端正,子女才能健康成长,社会才能健康发展。做好妇女工作,不仅关系妇女自身发展,而且关系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关系国家发展、民族进步。要讲好家风故事,引导广大妇女发挥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营造家庭文明新风尚。要积极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加强对年轻人婚

---

① 李婷:《当代青年生育观的多重向度》,《人民论坛》2023 年第 15 期,第 22—27 页。

② Hochschild A. and Machung A., *The Second Shift*,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3;杨菊华:《传续与策略:1990—2010 年中国家务分工的性别差异》,《学术研究》2014 年第 2 期,第 31—41+54+159+4 页;刘爱玉、佟新、付伟:《双薪家庭的家务性别分工:经济依赖、性别观念或情感表达》,《社会》2015 年第 2 期,第 109—136 页;Ji, Y. Wu X. Sun S. and He G., “Unequal Care, Unequal Work: Toward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Gender Inequality in Post-Reform Urban China,” *Sex Roles*, Vol. 77, 2017, pp. 765-778。

③ 於嘉、谢宇:《中国的第二次人口转变》,《人口研究》2019 年第 5 期,第 3—16 页;Budig M J. and England P., “The Wage Penalty for Motherhoo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6, No. 2, 2001, pp. 204-225; Yu W. and Kuo J C., “The Motherhood Wage Penalty by Work Conditions: How Do Occupational Characteristics Hinder or Empower Mother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82, No. 4, 2017, pp. 744-769。

④ 杨菊华:《“性别—母职双重赋税”与劳动力市场参与的性别差异》,《人口研究》2019 年第 1 期,第 36—51 页。

⑤ 於嘉、谢宇:《中国的第二次人口转变》,《人口研究》2019 年第 5 期,第 3—16 页。

⑥ 孙超、刘爱玉:《城镇化境遇及其对两性性别观念的型塑》,《人口与发展》2020 年第 5 期,第 112—121 页。

恋观、生育观、家庭观的引导,促进完善和落实生育支持政策,提高人口发展质量,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①。习近平主席虽然没有直接提性别观念的引导问题,但性别观念是有关男女在婚恋、生育、家庭分工、社会分工诸多方面两性"合适的"角色、权利、责任的态度和认知,性别观念与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交织,成为社会经济和人口发展的观念基础。我们不反对性别平等的性别观念,但是反对建基于抽象个人权利观念而无婚姻与家庭责任伦理的自由主义性别观念。

Employment Stability, Gender Role Concept and Fertility Desire

Liu Aiyu　Lu Yanxua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from seven phases of the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since 2010, this study has found out that among childless males aged 22-60 and females aged 20-49, the average value of fertility desire is 1.52, while among those with one or more children, the average value of fertility desire is 1.56. Their desire for a second or third child is extremely low. The fertility desire in China has reached a relatively low level. The post-1980s and post-1990s generations, as the prime childbearing group, exhibit lower fertility desires than other groups. This research identifies three main socio-structural and cultural factors that lead to low fertility desire in China. Firstly, precarious work and income disparity are influential factors. Precarious employment has rapidly increased since the 1990s. The proportion of precarious work is higher among those aged under 30. As precarious employment may affect the source of income and its stability, job stability moderates the fertility expectations of those parents with differently-aged children. The second factor consists of shifts in gender role attitude and gendered reproductive practice. Since 2010, there has been a shift of the gender role attitude towards non-traditionalization or egalitarianism, especially among younger generations born in the 1980s and onwards, which is a main cause for their lower fertility desire. Gendered reproductive practices, in which females take the primary responsibilities for childbearing and childcare, have weakened their fertility desire. Thirdly, large-scale internal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are important backgrounds for understanding the changes of gender attitude, and the fertility desires with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 in Chinese society. To understand the contemporary situations and transitions of fertility desires, we have to place them in a historical and generational context and examin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tructural changes in the labor market and the effects of precarious work and income disparity,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between gender role attitude and its evolution.

Key words: employment stability; gender role attitude; fertility desire

(责任编辑　管　琴)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0/ /content_6912723.htm。